

高等学校文科试用教材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科书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科书》编写组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试用教材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科书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科书》编写组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125印张 46万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
统一书号：4006·028 定价：2.00元

前　　言

本书是根据1978年12月国家统计局在四川峨眉召开的“全国统计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的建议编写的。当时建议编写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材有两本：一本是《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利用厦门大学业已出版的《统计基本理论》进行适当充实、修改，尽快付印，以满足当时统计教学上的迫切需要。该书已于1980年由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就是本书，要求根据我国统计工作的实践经验，借鉴外国适合我国需要的统计方法、理论，在《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于较长时间内编写成书。

按照峨眉会议的精神，本书在体系、内容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尽可能吸收数理统计学中可供社会经济统计运用的方法，并力图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全书涉及的统计资料，也基本上引用了最近年份的。但是，在探索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不成熟甚至错误的东西，竭诚欢迎各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继续朝着提高的方向努力。对本书的意见请寄：北京海淀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收转。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主编，天津财经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四川财经学院副主编。厦门大学主审。主编小组由下列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以下均同）组成：

组长：杨曾武（天津财经学院教授）、郑尧（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成员：陈允明（北京经济学院教授）、莫曰达（国家统计局副研究员）、高成庄（四川财经学院副教授）、徐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黄良文（厦门大学教授）、傅春生（北京经济学院副教授）。

本书各章执笔人是：第一章，杨曾武、郑尧、莫曰达；第二章，徐前；第三章，莫曰达；第四章，杨恩瑜（新疆财经学院讲师）；第五章，马永淑（北京商学院讲师）、王连香（河北大学讲师）、吴彬（安徽财贸学院副教授）；第六章，杨宏义（吉林财贸学院讲师）；第七章，杨宏义；第八章马富泉（上海财经学院副教授）、陈汉章（四川财经学院副教授）；第九章，高成庄；第十章，刘鸿熙（国家统计局统计师）、庞皓（四川财经学院讲师）；第十一章，黄良文；第十二章，姚志学（辽宁财经学院副教授）；第十三章，杨曾武；第十四章，莫曰达。

参加编写的还有：马家善（上海财经学院副教授）、马景江（吉林财贸学院讲师）、方人贺（内蒙古大学讲师）、车诚定（湖北财经学院副教授）、木柱（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讲师）、张学忠（辽宁财经学院讲师）、陈炳麟（新疆财经学院讲师）、吴敏（陕西财经学院副教授）、吴梅村（四川财经学院副教授）、杨遵庆（北京商学院讲师）、胡健颖（北京大学副教授）、栗方忠（辽宁财经学院讲师）、秦哲勇（陕西财经学院讲师）、曹毓侯（山西财经学院讲师）、董秀翰（黑龙江商学院讲师）。

杨曾武、莫曰达、高成庄、徐前、黄良文根据编写会议讨论的意见，对各章原稿分别进行了调整、补充和修改。

本书最后经杨曾武、郑尧、莫曰达总纂。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丁振京、王思立、刘奇、纪曾爔、季敏华、郑人权、林青、常大智、潘超霖等同志提供了不少切实的意见，本书全体编写人员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忱。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科书》编写组

1983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社会经济统计的产生和发展	(1)
第二节 社会经济统计的特点和作用	(10)
第三节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对象	(17)
第四节 社会经济统计学中的基本概念	(19)
第五节 社会经济统计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	(24)
第六节 统计工作过程	(26)
第二章 统计设计	(29)
第一节 统计设计的概念、种类和内容	(29)
第二节 统计指标的概念和种类	(40)
第三节 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的设计	(46)
第四节 关于三种核算的协调与统一	(52)
第三章 统计调查	(56)
第一节 统计调查的意义、任务和种类	(56)
第二节 统计调查方案	(59)
第三节 统计报表	(65)
第四节 其他调查方式	(72)
第五节 各种统计调查方法的结合运用	(78)
第六节 统计调查误差	(85)
第四章 统计整理	(87)
第一节 统计整理的概念、原则和步骤	(87)
第二节 统计分组	(90)
第三节 次数分布	(100)
第四节 统计整理的组织和技术	(117)
第五节 统计表	(124)

第五章 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	(132)
第一节 总量指标.....	(132)
第二节 相对指标.....	(145)
第三节 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的计算、运用原则.....	(158)
第六章 平均指标	(163)
第一节 平均指标的意义和作用.....	(163)
第二节 算术平均数.....	(165)
第三节 调和平均数.....	(174)
第四节 几何平均数.....	(180)
第五节 中位数和众数.....	(184)
第六节 平均指标的应用.....	(193)
第七章 标志变异指标	(196)
第一节 标志变异指标的意义和作用.....	(196)
第二节 全距和平均差.....	(198)
第三节 标准差.....	(203)
第四节 偏度与峰度.....	(215)
第八章 时间数列	(224)
第一节 时间数列的概念和种类.....	(224)
第二节 时间数列的水平指标.....	(228)
第三节 时间数列的速度指标.....	(241)
第四节 长期趋势的测定.....	(253)
第五节 季节变动和不规则变动的测定.....	(266)
第九章 指数	(277)
第一节 指数的概念和作用.....	(277)
第二节 综合指数.....	(282)
第三节 平均数指数.....	(290)
第四节 平均指标指数.....	(295)
第五节 指数体系.....	(300)
第六节 指数数列.....	(309)
第十章 平衡法	(312)

第一节	平衡法的意义和作用	(312)
第二节	平衡表和平衡帐户	(316)
第三节	投入产出表	(323)
第十一章	抽样法	(344)
第一节	抽样法的意义和作用	(344)
第二节	总体和样本	(349)
第三节	抽样估计的一般原理	(364)
第四节	抽样方案设计	(391)
第十二章	相关关系分析	(409)
第一节	相关关系分析的概念和任务	(409)
第二节	直线相关的测定	(413)
第三节	回归分析——简单直线回归	(423)
第四节	回归分析——曲线回归及复回归	(434)
第十三章	统计预测法	(455)
第一节	统计预测一般问题	(455)
第二节	统计预测模型和预测方法	(458)
第三节	朴素模型预测	(470)
第四节	长期趋势预测	(474)
第五节	季节模型预测	(487)
第六节	回归预测	(496)
第七节	统计预测分析	(504)
第八节	调查研究预测	(510)
第十四章	统计工作的管理体制和建国以来统计工作 的回顾	(514)
第一节	统计工作各阶段的相互关系	(514)
第二节	统计工作的管理体制	(517)
第三节	建国以来统计工作的回顾	(522)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社会经济统计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经济统计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统计学作为这种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也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回顾一下历史，对于我们学习理论、总结经验和开展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社会经济统计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经济统计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国家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在原始社会末，在奴隶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已出现了社会经济统计的萌芽。据《尚书》，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在国家所进行的天文观测和居民生活条件的调查中，在国家建立的贡赋制度和劳役制度中，已有“四极”调查点的选择和年、季、月、“二分二至”与365日的划分，已有“九州”地理区划，“九山九水”治理方案和“上中下三等九级”贡赋标准，数量和分组的初步概念已经形成。国外在古代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历史中，在有关国情国力的调查研究中，也有许多类似的记载。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社会经济统计已略具规模。据《商君书》，我国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在商鞅的调查研究思想中，已有了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登记制度和人口的按年龄、按职业的分组，已有了国民经济调查研究中的各种数量对比分析，把掌握反映基本国情国力的“十三数”定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到十七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统计的发展，“统计”一词已约定俗成，在《清文献通考》中有明文记载。

资本主义最早产生在欧洲。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资本主义

上升时期，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统计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人口、工业和农业的“国情普查”逐渐形成为制度，商业、工业、农业、海关、外贸、物价等方面的统计，先后都得到广泛的发展。十九世纪中叶之后，数学，特别是古典概率在社会经济统计中的应用，迅速开展。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在工人运动中，在无产阶级的组织中，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开始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统计工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经济统计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社会经济统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成为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

二、统计学的产生和发展

封建社会生产的落后，限制了统计实践和统计理论的发展。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统计实践的需要，产生了统计学。统计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十七世纪中叶在英国，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的问世，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统计学的诞生。在德国，差不多同时，产生了与“政治算术”并称的“国势学”。它们在统计学说史上，形成为长期并存的两大学派。

“政治算术学派”的创造人是威廉·配第（1623—1687），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算术》（1671年写出，1690年正式出版），这里的“政治”是指政治经济学，“算术”是指统计方法。这本书运用大量的实际统计资料，对英、法、荷三国的国情国力，作了系统的数量对比分析，阐明英国的国际地位并不悲观，提出了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配第的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社会分工的思想，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利用实际资料，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的方法，为统计学的创立，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对此，马克思评价他是“政治经济学之

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① 政治算术学派的另一创始人是约翰·格郎特（1620—1674），他的代表作是《对死亡率公报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当时，伦敦时疫流行，死亡情况严重，引起社会不安。格郎特根据“死亡率公报”，对伦敦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性比例和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分类计算和预测，证明没有悲观的必要。这本书所用具体的数量对比分析的方法，对统计学的创立，与《政治算术》起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政治算术学派的又一本名著。政治算术学派，以后还有一系列的统计学家和统计学著作，但一直未正式采用“统计学”这一科学命名，因此，被认为无统计学之名而有统计学之实。这是统计学的正统。

“国势学派”亦称“记述学派”。创始人是康令（1606—1681），继承者主要有阿亨华尔（1719—1772）和斯廖采尔（1735—1809）等。他们在大学中开设了一门新课程，最初叫“国势学”，因在外文中“国势”与“统计”词义相通，后正式命名为“统计学”。它搜集大量实际资料，分门别类，记述有关国情国力的系统知识，包括土地、人口、政治、军事、财政、货币、科学、艺术和宗教等。这个学派始终没有把数量对比分析作为这门科学的基本特征。

两个学派具有很大的共同之点，均以社会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均以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资料作为立论的基础，均认为自己这一门科学是具体阐明国情国力的社会科学。不同之点在于是否把数量方面的研究，作为这一门科学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这样的共性和个性，使得两个学派共同发展和相互争论达两百年之久。两个学派在欧洲各国以至在资本主义世界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十九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统计实践的要求，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分工，统计学作为一门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数量对比分析的方法论科学，已为社会所公认。两个学派之间的长期争论，始告平息。德国一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尼斯（1821—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2页。

1898)于1850年发表了他的论文《独立科学的统计学》(副题：关于统计学的理论和实际上的纠纷的一个解决——同时即是关于阿亨华尔以来之统计学的批判的历史的一篇论文)，概括了当时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大多数意见，提出了“国家论”与“统计学”科学分工的主张。“国家论”作为“国势学”的科学命名，“统计学”作为“政治算术”的科学命名。在统计学说史上，以这一论文的发表，体现了两派学术争论的结束。争论结束了，两个学派也就同时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统计理论的发展中，又产生了新的学派。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所创建的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逐渐为唯心主义哲学、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唯心主义社会学所代替。与此同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两种立场、两种观点和两种方法的对立，在指引着和影响着各门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与道路。统计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一百多年来，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主要有“数理统计学派”、“社会统计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统计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体系的指引下，又逐步形成了社会经济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派”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创始人是比利时的生物学家、数学家和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1796—1874)。他是比利时国家统计工作的领导人，是国际统计学术会议的倡导人和组织者。他写过许多有关社会学和统计学的著作，在统计学的发展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凯特勒的主要著作有《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的经验》(1835)、《统计学的研究》(1844)、《关于概率论的书信》(1846)和《社会物理学》(1869)等。其中，《社会物理学》是他的代表作。书中指出，他的社会物理学“是要给政治科学和精神科学附加上一

种以观察和计算为基础的方法，而支配着社会现象的法则和方法则是概率论。”书中还指出，社会物理学“应当研究那些巩固人类和社会制度并使社会制度成为第二天体力学的存续法则，而社会制度的神秘基础，则由宇宙创造者巧妙地安排妥当了。”“社会生活力学法则与无机物体力学法则，同样令人惊异。”关于“平均人”的理论，他指出：“我在这里所观察的人，在社会中，犹如物体的重心一样，他是一个平均数，各个社会成员都围绕着他摇摆不定。”

凯特勒在统计学的发展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把法国的古典概率引入统计学，使统计方法在“政治算术”所建立的“算术”的基础上，在准确化的道路上大大跨进一步。他运用这一统计方法既研究自然，又研究社会，对生物学和经济学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他的这一创见，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在不断应用。后经高尔登（1822—1911）、皮尔逊（1857—1936）、尤尔、包勒和费雪等统计学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数学。1867年有人把这一门既是数学、又是统计学的新生科学，命名为“数理统计学”。这就是数理统计学派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在学术观点上，数理统计学派认为：统计学就是数理统计学，是现代应用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通用于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方法体系。数理统计学派否认“政治算术”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统计学，否认社会统计学的存在。他们称凯特勒是“伟大的天才”，是“现代统计学之父”。

凯特勒对于统计学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但在理论上也有严重的错误：一是混淆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本质差别，二是夸大了概率论的作用。他把“政治算术”改变成为“社会物理学”，在“算术”上是进了一大步，在“政治”上则是倒退了。这和他的社会学观点是分不开的。他的社会学观点是不谈经济基础，专谈上层建筑的。这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针对这种社会思潮，恩格斯曾经指出：“第一，他们对于无论如何总是德国的光荣的

哲学竟肆行辱骂，第二，他们妄图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并且妄图修正社会主义。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他们了。”又指出：“如黑格尔已经证明的，这种见解，这种‘片面的数学观点’，这种认为物质只在量上可以规定而在质上则自古以来都是相同的观点，‘无非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观点。这种观点甚至是退回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去了，他正是把数、把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①正是由于这种理论上的错误，致使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远远落后于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妨碍了社会经济统计发挥其认识社会武器的作用。凯特勒的功过，马克思曾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1869年3月3日，马克思在给路德维奇·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凯特勒现在太老了，不能再由他作任何试验了。他过去有很大的功绩。他指出，即使是社会生活的表面上的偶然性，由于它们周期性的反复和周期性的平均数，仍然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他从来没有能对这一必然性作出解释。他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仅仅扩展了他观察和计算的材料。就是现在，他也没有超过1830年以前的成就。”②

“社会统计学派”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算术学派”的继续。他们认为，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目的在于明确社会现象内部的联系和相互关系。统计方法应当包括社会统计调查中的资料搜集、资料整理以及对统计资料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在社会统计中，全面调查，包括人口普查和工农业普查，居于重要地位；以概率论为根据的抽样调查，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实际的意义和作用。社会统计学派仍然坚持，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数理统计学则是一门应用数学。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资本主义社会，统计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发展日益受到社会制度的局限。立场观点方法，如果不能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资本主义一边。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6，2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83页。

义，就难以摆脱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数理统计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则相形见绌。社会统计学发展的停滞不前，这不能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也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诞生的。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的创始人。列宁（1870—1924）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第一国际的革命运动中，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统计，作为了解各国工人运动发展情况和资产阶级动向，制定国际工人运动战略策略的依据，作为教育和武装广大工人阶级队伍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从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广泛阅读了现实资料和历史资料，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包括统计学的著作。阅读统计资料，成了马克思的一种嗜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长期统计实践中，在对资产阶级统计资料的有分析有批判的利用中，提出了指导无产阶级统计工作的原理原则和方法，为建设无产阶级的统计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在统计学的发展中有巨大贡献的配第和凯特勒，都作了科学的历史评价。这对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统计科学遗产，指明了方向道路。他们提出正确估价和有效利用资产阶级统计资料的重要性，同时对其中的“欺骗性”、“蒙蔽真象的意图”和“捏造、歪曲”，也进行了必要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出“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从分析“典型”着手，注意绝对数（总量指标）、相对数（相对指标）和平均数的结合运用，注意数字之间的可比性和平均数的理论基础。利用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光辉典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利用一切机会，搜集了大量的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作了科学的评价和加工整理。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利用了一百多份统计资料，用“数字的语言”生动具体地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和特点。在研究世界工人运动的工作中，列宁花了几十年的精力，搜集了英国、德国、法国、丹麦、美国以及其他各国的政府统计资料和其他资料，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利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其他有关著作，都是在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十月革命后，列宁担任着苏维埃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列宁的指导下，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机关、统计管理体制和统计方法制度，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工作。1920年，定为苏维埃国家的“统计调查年”，先后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职业普查、农业普查、土地普查和简要工业普查，同时，还结合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点调查、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为制定方针政策和实行计划经济，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统计资料。

在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列宁第一次提出，“社会经济统计是社会认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明确了统计的基本性质。关于统计调查，列宁指出，不能按主观愿望“抽取个别事例”，必须“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关于统计资料整理，列宁指出，整理方法不当，同一资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关于统计分析，列宁提出了统计表和统计图在统计分析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平均数（平均指标）、分组法和对比法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列宁认为，统计分析不但要作定量分析，还必须作定性分析。列宁多次批判“计量而不较质”的错误倾向，指出：只作数量的计算和数字的罗列，不涉及事物的实质，那只能叫作“描述”，谈不上“统计分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提出统计是实行工人监督和国家监督的重要工具。这一系列的统计理论问题，列宁都是在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在

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的运用中，紧密联系实际提出来的。

“社会经济统计学”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的指引下，总结历史经验，继承科学遗产，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还在发展之中。苏联在十月革命前，统计学的发展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类似，占主导地位的是数理统计学派，但社会统计学派依然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国家的统计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指引下，得到很快的发展。苏联的统计学界，当时流行的统计学教科书，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三十年代末，才开始了这方面的改革工作。1954年在全苏统计学科学会议上，作出了一个初步结论，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在与质的方面密切联系中，研究大量社会现象的量的方面，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数量表现。”会后，苏联的一批统计学家，在斯特鲁米林院士的主持下，编写了一本统计学教科书，系统阐述了会议的观点。会议的决议和这本教科书，对新中国建立后的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我国在解放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统计工作落后，统计学基本上照抄照搬西方，传播的主要数理统计学派的观点。解放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学习苏联统计工作经验的同时，引进了苏联的统计学。现在看来，苏联按照1954年“结论”所编写的统计学教科书，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统计理论建设，有积极的一面。例如，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把社会经济统计的作用确定为认识社会的武器和国家管理的工具；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社会统计学的科学成果。但它认为统计学只有一门，即社会经济统计学，无视统计学已发展成为跨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多科性科学；贬低数学特别是数理统计方法在社会经济统计学中的作用；批判方法论观点，忽视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实质性科学与方法论科学这一科学分工的现实，对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是有消极影

响的。总的说来，在1978年以前，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理论的发展，比较缓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经济统计学在我国有一定的发展和变化。广大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我国统计实践经验，学习外国经验，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统计学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当前，在统计理论建设中，不同的学术观点正在发展。

第二节 社会经济统计的特点和作用

一、社会经济统计的特点

社会经济统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调查研究活动，或者说，是对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认识活动。

人们要改造世界就要认识世界。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任何认识活动都是认识的主体对认识的客体（对象）所发生的一种反映关系。认识活动就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活动。经过反映活动，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成果就叫做认识。

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自觉地、被动地反映；一种是自觉地、能动地反映。人们根据一定的目的，采用一定方法，自觉地、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活动，就叫调查研究活动。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如实地加以反映。不同的认识对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对它们进行调查研究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很多种，社会经济统计是其中的一种。首先，社会经济统计的认识对象不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全部，而只是它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其次，社会经济统计这种调查研究活动，作为一个过程来说，也有它不同于其他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活动的特点。

社会经济统计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数量性。

社会经济统计的认识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包括：